

中国的经济开放与经济型人口流动

李仲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100026)

摘要: 本文从地区工资差别和就业机会的理论出发, 论证了中国的经济型人口及劳动力流动的变化, 并根据哈里斯和托达罗的模型, 结合作为中国典型的人口流动现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趋向, 提出了经济开放刺激的城市经济环境是诱发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经济开放; 经济型人口流动; 农村城市间人口流动;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1)06-0037-06

The Economic Opening and Economic Population Migration

LI Zhong-she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26)

Abstract: From the view of regional wage differentials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eori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nge of labor force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model by Harris and Todaro, combining with surplus rural labor forces moving towards urban areas, this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the opening economic environ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Keywords: economic opening; economic population migration; rural-urban migration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 地域间、城乡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大量的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域的内陆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域的沿海开放地带, 由农村向大中城市流动, 并且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全国范围内膨胀起来。地域间、城乡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一些负面效果, 人口流动政策的探讨成为重要的课题。本文拟从经济人口学 (economic demography) 的视野对经济型人口流动和对农村部门劳动力向城市部门流动进行粗略的分析。

一、经济型人口及劳动力流动

从人口流动发生的成因而言, 议论的重要话题之一是经济因素。其代表的理论是工资的

收稿日期: 2001-04-25

作者简介: 李仲生(1951-), 男, 北京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研究员, 日本早稻田大学特约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地域差别和就业机会差别的假说。约翰·里查德·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在《工资理论》中以劳动力的地域间流动作为理由指出：“工资的地域差别是不容忽视的”^[1]。另外，馆稔在《日本的人口流动》中提出：“一般来说人口具有由生活水准低的地域向生活水准高的地域流动的倾向”^[2]。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与收入或工资的差别，成为劳动者流动的最根本原因。而西奥多·外拉姆·舒尔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在《稳定经济中的农业》中历史地观察了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方面的劳动流动，他分析了农业人口向工业流出的条件，其结果是“就业机会的存在要求农业人口从农场流出或者是继续停留在农场”^[3]。这两种假说所显示的人口流动的动态变化虽然不能完全说明中国的经济型人口流动的变化，但用工资的地域差别论和就业机会论是基本上能够说明其变化过程的。

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中国带有半强制性性质的人口流动较多，根据个人自由意志的自发流动、自愿流动或自由流动由于人口流动抑制政策而被限制。之后，人口流动抑制政策渐渐地缓和，人口流动在全国各地频繁起来。由农村向城市、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寻求就业机会的流动人口呈现出迅速增长趋势。从流入者的就业领域来看，主要是城市建筑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及手工业等业种的就业；从人口流动的原因来看，经济业务的联络、招工顶替、复员转业、学习培训、知青返城、退休退职、投亲靠友以及随迁家属等。其中经济型人口流动成为人口流动的主流。

1984年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这种流动倾向越来越强烈。上海市的流动人口在1984年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比率仅占13.3%。随后，由于城市的全面开放，经济型流动人口不断增大，1988年剧增到63.30%。兰州市和郑州市经济型流动人口的比率也很高，在1990年分别为82.90%和72.20%^[4]。据调查统计，北京市经济型流动人口的比率在1997年达到了62.6%^[5]。最近，随着全国大城市经济开放的加速化及其经济的迅速发展，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人口流动趋势越来越迅猛，在全国流入城市的人口中大约占60%~70%，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到城市从事建筑业、工业、运输业以及服务部门的青壮年劳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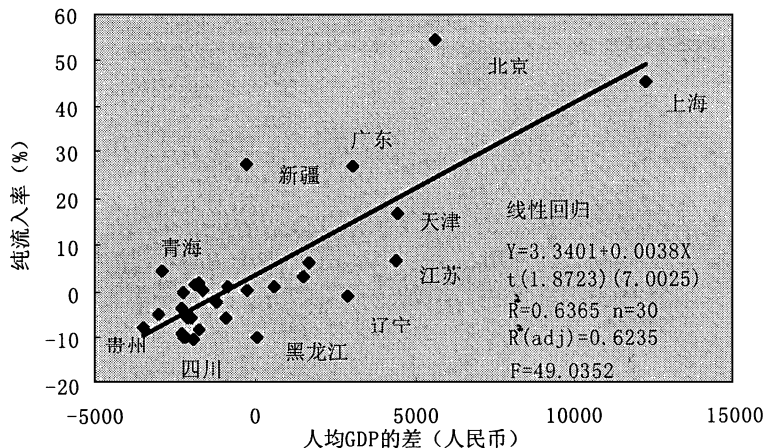


图1 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均GDP水准的差和人口纯流入率(1995年)

说明：线性回归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版《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5年》计算作成。

从地域间人口流动与作为就业机会一个尺度的人均GDP水准的相关分析来看，图1是1995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均GDP水准的差和人口纯流入率的结合值，两者是正相关

的。北京市、上海市以及广东省的人均GDP水准如图1所示是很高的,流动人口的纯流入率分别达到了53.40%、45.30%和27.50%,超过全国的平均纯流入水准。近年以来,随着地域间经济差别的扩大,大部分流动人口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域,特别是上述经济发达地域的流入劳动力人口极其活跃。

表1是根据公式的统计资料推算的劳动力产业间流动。就推算的方法而言,采用了渡边利夫的推算方法。即观察期间特定部门的劳动力增长数为 X_i ($i=1, 2, 3, \dots$),劳动力自然增长数(该数值以1978年的实际值作为基准,根据后述的全部门的平均增长率算出)为 Y_i , $X_i - Y_i$ 是该部门的流出及流入劳动力数。而且每个部门的自然增长数 Y_i 假定推算与全部门的平均增长率相等。其次,第一产业假定是纯流出部门,第二、第三产业向第一产业的逆流入不存在。从表1来看,1978年到1999年的21年间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流出量达到1.44亿人,其中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吸收了4027万人和10391万人。换言之,1978年以后,随着产业部门间收入差别的扩大,加速了产业部门间经济型劳动力流动。

表1 经济型的劳动力在产业部门间流动(1978~1999年)

万人

产业别	1978年实际值	1999年实际值	1999年推算值	1978~1999年流动量
第一产业	28318	35364	49782	-14418
第二产业	6945	16235	12208	4027
第三产业	4890	18987	8596	10391

说明:1999年推算值用1978~1999年21年间全部门的增长率充当各部门的增长率求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116。

总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更加活跃和东部沿海地域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典型的人口流动现象,由经济落后地域的中西部内陆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域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流动、由传统的第一产业部门向近代的第二、第三产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动急速膨胀。由此可见经济型人口及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主要是由于就业机会的增大和收入差别的扩大引起的。其结果人口流动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化,达成资源分配的效率化。与此同时,带来了由经济发达地域向经济落后地域的收入转移,促进了地域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大量的人口流动某种程度上对于经济发展不利也是显而易见的。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中青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带来了流出地的劳动力过疏化和老龄化,使一部分地域出现了农业经营的不景气和本地产业的停滞现象。因而,经济落后地域雇用机会的扩大、收入水准的提高以及经济发达地域的适当的人口流动抑制政策的实施等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城市间人口流动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活动由过去僵硬的封锁经济渐渐地转换为积极的开放经济,城市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80年代中叶以后,封闭的人口流动抑制政策逐渐放宽,就业机会增多,使人口流动渐渐呈现自由化。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了大规模的迁移流动,冲破了土地的束缚,急速地涌向城市。其类型基本是寻求好的就业机会的劳动力流动。人口流动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典型现象。

随着沿海城市的开放,吸引了大量的知识集约型合资企业(equity joint ventures)、合作经营企业(cooperative joint venruess)及外资企业(foreign-owned enterprises),并创立了各种类型的新企业。另外,政府在1984年10月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转移户口问题”的通知,随着

城市经济的开放和劳动雇用面的扩大,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数量急速地增大。特别是大城市流入人口的增势是显著的。上海和北京等主要城市的日平均流入量在 1984 年为 327 万人,流入人口比率达到 12.62%,1989 年上升到 696 万人^[9]。流入的要因主要是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职业需求量大,其次是经济业务联络以及探亲访友。

从 1990 年 7 月第四次全国人口调查的结果来看,城乡间 1 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为 3384 万人,其中农村流向城市的最多,占流动总人口的 48.53%。这些流动人口仅仅是离开户籍所在地 1 年以上的,如果包括 1 年以下的临时流动(temporary migration)、季节性流动(seasonal migration)的话,其流动人口的规模会更庞大。另据国家统计局 199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由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人口在 1990~1995 年间占全流动者的 35.99%,显示了较高的比率。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经济开放刺激的城市经济环境是产生流入人口的根本原因。在这里为了说明与经济开放的关系,作为说明城乡人口流动原因的假说,采用了约翰·里斯·哈里斯(John Rees Harris)和迈克尔·P·托达罗(Michael P. Todar)模式^[9]。这个模式对二重经济论不能说明大量城市失业现象而言,根据城市部门的工资和农村部门的工资差别以及在城市获得工作的概率,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结果进行了说明。

在哈里斯和托达罗的模型中,假定农民根据城市部门的预期工资与农村收入的经济相比较,决定流动趋向,城市部门的工资以及农村部门收入的变化分别是 W_m 、 W_a ,假如 C 作为流动费用的话,在流动中经济的纯得利 $V = W_m - W_a - C$ 。农民由城市的预期工资和农村收入的差别到 0 为止持续地向城市部门流动。在这里,存在着城市失业以及以低生产、低工资、不完全就业为特征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其主要特征是:①低参与障碍。②当地资源的利用。③家庭经营。④小规模经济单位。⑤劳动集约低的技术水准。⑥公共机关以外的技能学习。⑦没有公共规章制度的竞争市场等。因而这个部门的参与与其他部门相比较容易。这些一般部门是小商人、行商、露天商、修理工、商店的帮工、出租司机、家务杂事以及日常劳务者等杂工种。另一方面,农村移民的大部分不能加入城市正规部门。以上的假定城市的预期工资(W_u^*)等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W_m)乘上其工作机会的概率(p),即 $W_u^* = pW_m$ 。

如果考虑农村部门向城市部门流入等于获得工作机会的话,城市工作机会的概率(p)根据下式算出。

$$p = \frac{L_m}{L_m + L_u} \tag{1}$$

但是, L_m 和 L_u 分别是城市正式部门的雇用数和失业数。由城市的预期工资(W_u^*)和就业概率(p)的 2 式得出经济的纯得利(V)。

$$V = \frac{L_m}{L_m + L_u} (W_m - W_a - C) \tag{2}$$

上述关系如图 2 所示,现代城市正规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分别是 MM' 、 AA' 。假如城市正规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工资没有僵硬性,通过流动进行工资平衡的话,两部门边际生产力的交点 E 达成均衡。这时,农业部门的收入(W_a^*)与城市部门的工资(W_m^*)相等。然而,实际上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是人为的高设计。如果不考虑城市部门的失业,城市正规部门不能吸收所有的雇用是 W_a^{**} 的低工资,只能在农村雇用。

根据哈里斯和托达罗模型的假定,如果城市的预期工资超过农村收入,劳动力呈现由农村向城市流动。那么,城市部门的失业或者城市非正规部门的规模是怎样决定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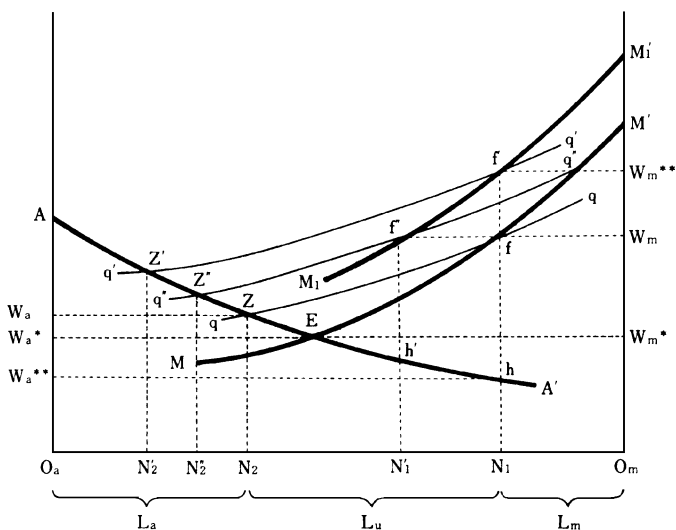


图2 哈里斯和托达罗模型

资料来源: 冈部达味、毛里和子,《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289 页。

假定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是 W_m , 城市正规部门和农村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别是 hf , 那么这种差别将发生农村向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流动。但是, 如果考虑城市正规部门的雇用是固定不变的话, 随着人口流动的增长, 城市失业增加, 就业概率下降, 导致城市的预期工资降低。流动人口工资差别延伸到 0 点为止。这就是预期工资的下降曲线 qq 的轨迹。新均衡点 Z 表示为城市正规部门的雇用量 L_m 和农村部门的雇用量 L_a , 而城市失业以及城市非正规部门是 L_u 。

这时, 城市正规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由 $M_1M'_1$ 向 $M_2M'_2$ 移动。工资由 W_m 上升到 W_m^{**} 时, qq 曲线向 $q'q'$ 曲线移动, 如果雇用不变的话, 工资差别扩大到 hf' 。这时 $q'q'$ 曲线和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 AA' 的交点 Z' 比 Z 向左上方移动, $N_2N'_2$ 只是城市部门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 工资不变而雇用扩大的情况下, 工资差别缩小到 $h'f'$, 而 $q''q''$ 曲线向左上方移动, 在 Z'' 点与 AA' 曲线相交。这样城市正规部门的雇用机会扩大 ($N_1N'_1$) 如果没有超过城市失业的增加 ($N_2N'_2$), 其结果城市失业的绝对量增大。

哈里斯和托达罗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是一种假定。这种经验的假定也有人提出质疑。在此与中国现状有关的, 只提及一个问题。该模型认为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以后, 非正规部门的雇用者期望加入城市正规部门, 是等待时机的预备军。因而, 对城市期待工资而言, 没有考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资。该假说与中国的实际状况是不符合的。中国农村大部分劳动力流动到城市, 是考虑以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和工资做为其目的, 因而进一步考虑劳动力行为模型的精确化是有必要的。

笔者认为: 哈里斯和托达罗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论证了工资水平、就业机会的概率以及流动费用等经济因素是决定城乡间人口流动的主要诱因。而且表明只要城市部门的预期水平高于农村的预期收入水平, 劳动力人口就会源源不断地由农村部门向城市部门流动, 这一理论表述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中国的城乡间劳动力流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此, 以城乡间劳动力

流动和经济开放的关系作为焦点,用哈里斯和托达罗导的模型来探索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原因。

第一,城乡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在 1992 年以后,随着经济开放的加速化,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与此同时沿海城市及内陆的大城市由于经济发展的比较优越性(comparative superiority),实施了比农村部门更灵活多样的开放政策。其结果国内外的大量资金投入沿海城市和内陆的大城市,城市和农村的工资差别进一步扩大,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地流动。

第二,城市就业机会的概率与流动人口相关连。随着城市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劳动合同制的导入等一系列劳动制度改革,导致城市部门劳动力的就职岗位多样化,特别是城市非正规部门的雇用量增大。这样除了城市的固定工以外,大量雇用了农民工,即临时工和合同工,由于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入,使城市部门职工的完全失业者和不完全就业者人数不断增加。随着城市居民工资水准的提高,对过去比较轻视的建筑业、运输业、个人商业以及服务业的雇用需求加大,扩大了农民在城市的就职门路。这样,使农民的城市预期工资上升,加速了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趋势。

以上,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动机及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使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一些正负面效果。如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人口的各种观念的更新,以及对流出地带来的很多好处。与此同时也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如社会治安的恶化以及非合法经济活动的增加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问题。

三、结论

随着地域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差别与城乡间收入的扩大,加速了城乡人口构成转换过程。从人口流向来看,农村人口向城市经济部门流动成为最典型的现象。就人口流动的原因而言,主要是由于城市建筑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等的就业、经济业务的联络以及个人商业等经济的因素引起的。

经济型人口流动带来了一定积极的经济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就流入地而言,流入人口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成为劳动力相对不足的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部门的主力军。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提高了流入地的劳动生产力,由此产生了更有效的经济价值。对于流出地而言,人口的流出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使人力和物力得到合理的配置,提高了地域的边际生产力,从而促进了地区产业的高效化。

农村人口向城市部门的流动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在中西部内地由于人口大量流出,一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弃农经商,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劳动力老化。与此同时,还带来经济发达地域的人口过密化和经济落后地域的人口过疏化、城市部门雇用吸收力相对减少等各种问题。今后应有计划地促进沿海地域和内陆地域间较均衡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经济差别和收入的差距,通过发展农村地区新兴乡镇企业增强雇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制定相应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和政策,改革现存的户籍制度。减轻经济型流动人口对沿海地域和城市部门的压力,有利于实现人口流动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见第 78 页)

偿付能力、现有经济效益等作详细的调查了解,从而做出决断。为利于增加回报和转移风险,可选择那些可以上市交易的品种进行投资。

4 参与股票投资。参与股票投资有以下优点:一是持有股票者能参加公司决策,决策权的大小,视股票多少而定,只要公司经营良好,每年可获得一定数量的股利,是一笔较稳定的收入;二是市场流通变现性强,并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三是通过增股获取收益。但投资股票风险很大,因为投资股票不能退本金,投资者能否获利,完全取决于公司的盈利情况,利多多分,无利不分,公司破产就有可能血本无归。因此,投资股票应学会采取分散风险的办法和策略。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智利等拉美国家,养老基金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上的主要股票持有者,构成了机构持股者的主体。我国保险基金要进行此类投资的前提必须是股票市场的规范性和健全性。规范性是指股票的市场价格要符合公司的实际市场价值,健全性是指要有一个完善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使股票能够得以有序地流通。原则上讲,由于保险基金要作长期性投资,应首选进入一级股票市场,成为上市公司的稳定持股者,然后再根据基金法人的投资策略和流动性需求,决定是否以及如何进入二级市场。

5 投资参股于银行。这是一种较稳妥的增值方法。股份制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财产组成形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须借鉴的产权制度。社会保险基金可通过向银行参股,取得比银行利息高的经济效益。

6 参与海外投资。海外资本市场近年来为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险基金所关注。保险基金进入海外资本市场的优点是,可以利用资产组合的国际多样化来减少国内资产组合的风险。缺点是由此而要承担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变化而带来的风险。由于海外资本市场难以控制,因此往往在基金投资领域排在较后的位置。如果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稳定的话,进入海外市场的风险就会小些。

保险基金还可以向其他金融工具投资,例如住房抵押贷款、房地产、期货、期权等,但对这些方面的投资要与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相适应,这样才能从资产组合多样化中获利。特别是对新出现的衍生金融工具要持谨慎态度,只有当这些金融工具本身具备较为稳定的风险转移机制后,才可以成为保险基金的良好选择对象。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育水平尚低,可供选择的较为成熟的投资工具少,缺乏相关的高素质人才和经营管理经验,因此,可先进行小规模试点。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投资工具的进一步完善,再逐步降低国债购买和持有比例,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和扩大投资渠道。总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保险基金通过投资运营来保值增值都是必然选择,我们应借鉴国外成功的保险基金投资的经验,加强对保险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努力确保保险基金的保值和增值。

参考文献:

[1-4] 厉以宁. 中国社会福利模型——老年保障制度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崔凤垣]

(上接第 42 页)

参考文献:

[1] Hicks, J. R., The Theory of Wages. London, Macmillan, 1932 76. /内田忠寿翻译. 工资理论. 东洋经济新报社, 1952. 68.

[2] 馆稔. 日本的人口流动. 古今书院, 1961. 171.

[3] Schultz T. W., Agriculture in an Unstable Economy, New York, McGraw-Hill, 1945. 101.

[4] 郭庭柏. 我国流动人口的现状及宏观调控. 人口学, 1991, (3).

[5] 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办公室编. 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资料.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7.

[6] 沈益民等. 中国人口迁移.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2. 216.

[7] Harris, J. R., Todaro, M. P. and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 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0, No. 1, 1970. 126-142.

[责任编辑 王树新]